

WANG JIA LIANG
XUE SHU WEN JI

1

王嘉良学术文集

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·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WANG JIA LIANG
XUE SHU WEN JI

1

王嘉良学术文集

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·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嘉良学术文集. 第1卷,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. 上/王嘉良著.
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10

ISBN 978-7-5321-4250-7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王嘉良-文集 ②文艺思潮-研究
-中国-现代 IV. ①I217.2 ②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06948号

王嘉良学术文集 第1卷
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·上

王嘉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金华市三彩印业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889×1194 1/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36000

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5321-4250-7/I·3284

定价: 386.00 (元) (共12卷)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79-82676863

目 录

自序	2
引论	31

上编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

第一章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地位	37
一 中国新文学首选现实主义的必然性	38
二 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多样复杂性	46
三 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走势与形态类别	49
第二章 启蒙现实主义	58
一 启蒙思潮与现实主义的联姻	58
二 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关注点	70
三 五四文学中的启蒙现实主义	77
四 伟大的启蒙现实主义作家鲁迅	83
第三章 人道现实主义	97
一 人道精神对于丰富现实主义的意义	97

二	周作人建构人道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	104
三	中国现代文学中三种“人道关怀”文本	115
四	人道现实主义文学的曲折历程	126
第四章	社会批判现实主义	131
一	批判性:现实主义的灵魂	131
二	“社会批判”型的一般形态	140
三	“社会批判”与“社会剖析”的融合	149
四	典型的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作家茅盾	155
第五章	“为人生”现实主义	166
一	文学与人生:现实主义的不竭话题	167
二	五四“人生派”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高扬	176
三	“为人生”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层拓进	185
四	典型的“为人生”现实主义作家巴金	191
第六章	民俗文化现实主义	200
一	现实主义文学的民俗文化视角	200
二	乡村风情和都市风情	212
三	沿海风情和边地风情	219
四	老舍:文化现实主义作家的典型代表	224
第七章	心理体验现实主义	234
一	“灵魂的写实”:现实主义的反思与深化	234
二	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独创性	246
三	七月派创作:“心理体验”型的文本呈现	256
第八章	政治化现实主义	267
一	现实主义的宿命:政治与文学联姻	268

二	现实主义创作中“阶级政治”的阐释	277
三	文学创作中“民族政治”的阐释	287
四	政治化现实主义文学的得失	295
第九章	现实主义的当代承续与流变	301
一	启蒙文学的微弱呼应	303
二	人道关怀的失落与复归	315
三	社会批判传统的当代延续	335
四	文学“为人生”的“失语”与回归	351
五	“文化寻根”的延续与变异	366
六	“心理体验”创作的失传与反思	384
七	建国后“政治阐释”文学的得失启示	401

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*

*《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。本书为浙江省高校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成果。

自序

今年7月31日,是我的七十初度,转眼间我已到了老辈人所说的“古稀”之年了。人到“古稀”,来日无多,常会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,生出许多莫名的感慨,对自己的前世今生总怀着些眷念、顾盼之意。此刻我最想做的一件事,便是对此生磕磕碰碰走过来的路径作一个简略盘点,以对自己、对人生,都有个交代。我这一辈子做的主要是与文字、学术有关的工作,要是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还留下些许痕迹的话,那也就是多年来积攒下来的这一大摞文稿,于是就有了编辑、出版这套学术文集之举。

说到学术,立即会想到那些高深莫测的学术、学问,然而我所写的文字,所做的研究工作,都浅薄之至,大约都可归入“无足观”之列,我也并无忝列于学问家的意思。但仍将其冠以“学术”之名者,毕竟由于它们同学术有些关联,所以且姑妄从之。我对于做学术条件的欠缺,是有自知之明的:这便是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失,其中包括缺失做学问的气质、秉赋和知识储备,以及后天学术环境的变幻莫测、无所适从。此生误从“学术”,实出于各种机缘,后来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,竟然发生了兴趣,也慢慢悟出一点门道,但终究由于功力不够,所得就很有限,且做得并不轻松。

回望我走过来的学术之路,充满着曲折艰辛,可谓甘苦备尝。

今天趁着盘点过往的学术路径时，我想说一说我对学术的理解，我的学术之路的选择过程，我做学术经历的种种曲折与艰辛。这里不妨先从我的学术梦说起。

—

我在年青的时候做过许多梦，考入中文系，当一个作家，便是最美妙的一个。可进入师范学院中文系以后，发现这里并不培养作家，你想进行创作尝试，反而被视为专业思想不巩固，为此我还同一位写作课老师吵过一架。这样一个闷棍敲下来，在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，于是我就有了“梦碎”似的感觉，心头的落寞之感是难以名状的。

当然，很快就会梦醒的。只要认真进入文学课程的学习，明白“作家之路”是怎么形成的，当一个作家尤其是有成就的作家需要有多少积累与素养，就不难理解圆一个作家梦是何其不易，也才知道自己先前的想法有多么幼稚。那么，我的“出路”在哪里呢？如果这辈子不想做一个平平庸庸的人的话。

正如鲁迅所说，最可怕的是梦醒了又无路可走。当时我就处在这样的尴尬之中了。应该说，我在青年时期对“出路”的理解是有很多片面性的，我的“抱负”中也有许多不合理的成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：那时我对师范专业的认识非常肤浅，不知道当一个好的中学教师也颇为不易，其价值并不在大学教师之下；而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中小学教师地位很低，总觉得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一个中学教师是亏待了自己，也对不起爹娘。五、六十年代的农家子弟进大学读书，有多么艰辛，这是今天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，但千辛万苦跳出了“农”门，却只谋到一个中学教书匠的职位，怎么说都是心有不甘。加以其时年少气盛又心高气傲，自以为中学时期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总是受到老师、同学的夸奖，高考时选择文

科,确实实是出于对文学的喜好,并非其他课程学得一塌糊涂不得已才考文科的,如此拳拳之心,却缘何总是得不到文学的眷顾,考不上一个完全可以搞文学的高校呢?“心高于天,命薄如纸”,便是当时生出的无穷感慨。

我面临的尴尬,并不止于专业本身,还有学校的背景。进高校后,不能实现作家梦,但倘若有所追求,还有一条学术路可走。我们的老师就常说,搞文学研究,如学有成就,也可以成为专家、学者,比如某某就是在学生时代脱颖而出的。这于我很有诱惑,但这可能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梦。环顾我们的学校条件,简直就没有提供这样的可能。今天的浙江师范大学早已今非昔比,省重点大学的地位,雄厚的师资,一流的图书馆,学术研究已蔚然成风,科研成果在全国都排得上名次。但五、六十年代草创时期的“浙师院”却并非如此。当时学校的规模很小,图书、师资等条件都远不如人,学校在全省高校中的排位,只能敬陪末座。1961年我进校读书时,中文系连一名副教授都没有,而离我们当时中文系所在地(杭州文三路上宁桥)仅一桥之隔的杭州大学中文系,却是教授满园、名流云集,两者相较,就越发见出寒碜,简直就是霄壤之别,于是也就有很多的自卑。那时候学校基本上没有科研的风气,甚至连师范院校要不要搞科研都是经常讨论的话题,更罔论有什么科研氛围了。所以,对于师范生来说,做学问都是非份之想。应该说,我对于文学有所追求,期望在专业学习上有更大的进取,本也无可厚非,但我面对的简直就是无路可走的窘境。

然而,机会总是有的,就看你如何去把握。

1960年代头三年,我们国家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。当时陈毅副总理发表讲话,鼓励学生又红又专,并且把“专”放到很重要的位置,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,高校中就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环境。那时候,向科学进军,成为一个时行的口号,名教授的“治学经验”不时见诸报端,在我们师范生面前同样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。这终于使我们也不安分起来,颇有跃跃欲试之态。我与同班的

陈增杰同学相约：他对古代文学颇有功底，就向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发展；我对现代文学感兴趣，则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努力。总之，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，于是就在学术上结为好友，常常在一起谈论学习心得。那时我们最需要懂得的是做学术的方法，渴求名师指点迷津。我们学校没有名教授，治学的氛围当然也比较薄弱，而当时在报上发表治学经验的杭州大学教授就近在咫尺，不妨向他们去讨教。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与增杰相邀，曾两次造访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。增杰是温州人，与夏先生同乡，我们很顺利见到了夏先生；夏先生也并不嫌弃我们是来自一所小学校的中文系学生，总是有问必答，而他的博学、睿智，真使我有高山仰止之感。他讲过的话，我大都忘却了，但有两句却深印脑际，可谓受用终生。一句是讲“笨从本”，意思是做学问倘若自觉愚笨，就必须老老实实从“根本”做起。另一句是“案头书要少，心头书要多”，读书求知，固然需要有书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将知识融化在心，方能做到融汇贯通，学有所成。夏先生的教诲，使我们的心胸豁然开朗。这样的一段求知经历，虽说对以后的学术并不产生直接影响，但在潜意识中所起的作用却是非常之大。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铸成，有时可能就产生在一念之间或一得之见。我们班上的同学，后来在学术上一路走下去的，就是我与增杰二人。他搞古代文学研究，终生不改，作出了很大成就；我则至今仍在现代文学道路上摸索、探求着。

正是在这样一股崇尚学术的风气中，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了我的学术梦。我从夏先生那里听来的“笨从本”，此时就用上了。我在大二时，硬是用一年的课余时间通读了10卷本《鲁迅全集》，做了不少笔记，那可以算是我最初的“研究工作”。我阅读的1956年版的《鲁迅全集》，有详备的注释，读起来并不费力，当然也有些篇章似懂非懂的，特别是《坟》中的几篇文言论文，实在读不懂，就翻过去了。但此次的阅读，的确是获益匪浅，我不但对鲁迅作品有了整体感觉，而且还因鲁迅及于对一部中国文学史、文化史的了解，因为后者在鲁迅的文章和“注释”中都有详尽记述。徜徉在鲁

迅这个奥妙无穷的艺术、知识世界中,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,对学术产生了一种既仰慕而又敬畏之感;而且也只有在这时,学术才真正亲近了我,我也亲近了学术。90年代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说过,是鲁迅“感召”我走向学术,此话是一点也不假的。通读鲁迅后,我读现代文学课程就很轻松了,而且还触类旁通,常常对其他课程的学习,也小有见解,于是就很得老师青睐。当时我还尝试着用鲁迅文笔写文章,竟小有所获。在大二、大三两年,接连在《浙江日报》文艺副刊《钱塘江》、《羊城晚报》文艺副刊《花地》发表文艺短论、杂文多篇,这算是我最初的“研究成果”。这些文字,今天看来当然都是“小儿科”,尤对学术而言应不足为训,但在当时报刊甚少的情況下能够发表文章已是不易,更何况这还是出之于一位低年级的本科生之手,我所受到的鼓舞之大是可以想见的。这一段时间的学习,对于我以后走向学术产生重要影响。后来我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了,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鲁迅,便同这一时期的积累不无关系。

由于上天的眷顾,我的“私愿”竟在大学毕业以后不期然实现了。由于我在本科阶段书读得不错,又能写出一笔“老气横秋”的文字(高年级同学对我练笔文字的赞语),毕业以后我的工作岗位就被摆在了高校了:留校任助教,稳稳当当成了一个大学教师。那时,在我面前似乎展现了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,潜心学术的意愿仿佛已触手可及,自己也是豪气万丈,自以为凭着我的才气和苦斗精神,仿佛马上就可施展拳脚,实现我的学术梦了。

但不幸的是,这样的美梦很快又被击碎了。60年代中期的政治大环境,已是“阶级斗争为纲”不绝于耳,使真正的学术研究渐行渐远,而随之而来的更为波澜壮阔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则终于把一切的学术梦彻底粉碎。我于1965年暑期大学毕业后,即奉命赴慈溪县参加为期一年的“社教”(据说这是大学文科毕业生的“必修课程”);1966年夏,文革开始,我被急召回校,参加本校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此后,便是梦魇似的十年文革。在这样的政治阴影笼罩下,

“学术”两字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。文革十年中，要谈于学术有所收获的话，是我有机会重读了鲁迅，而且比过去读得更懂了些。因为文革是“罢黜百家，独尊鲁学”，“读一点鲁迅”曾是毛泽东的号召，不仅并不犯忌，而且还是大力提倡的。当然，那时“尊鲁”的目的是借助钟馗“打鬼”，鲁迅是被当作工具使用，毫无学术可言，我从那时的“鲁迅研究”中并没有得到学术上的长进。文革中、后期，由于我的文字能力被人赏识，一度调离高校，去写一些宣传阶级斗争、继续革命的文章，那就同学术毫不相干了。而且，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，文章也不好做，可谓动辄获咎，搞文字的人常被播弄于无形的政治游戏中，一不小心就犯了错。

文革中有件事，在我心头烙下了永远的痛，这辈子终难忘怀。此事发生在1971年，当时我在金华地委写作组工作，一次奉《人民日报》稿约，为那时非常知名的农民哲学家姜汝旺同志代笔，写过一篇题为《先验论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动》的文章，由姜汝旺署名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1971年5月28日第2版。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，是批判当时所说的“陈伯达一类骗子”宣扬的“天才论”，通过谈学习毛泽东《实践论》的体会，予以批驳。我对老姜作了采访，由他谈学习体会，我执笔整理成文。按理此文是谈毛泽东哲学思想，又非常符合当时的“斗争大方向”，应该是万无一失的，但想不到却闯下了大祸。原来此文见报后，被张春桥读到，他“看”出了其中的“问题”：是“名为批判天才论，实为宣传天才论”，是“打着红旗反红旗”，并且断言，这篇文章肯定不是一个农民写的，是知识分子“强奸民意”。后来就一路追查下来，文章确乎是我代笔，我这个民意“强奸犯”纵然浑身是口也说不清了。这篇文章前几天我找来读过，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，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禁忌，又是怎样“打着红旗反红旗”的，但那时只好自认所有的“罪错”。文章发表时，并非由我署名，我没有沾到丝毫“名利”，一旦出“问题”了，我必须承担全部罪过。这便是我当年担负“操刀者”角色的可悲命运，由此也使我做文字工作生出许多怕意。

回顾这一段历史,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。五、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,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,有时似乎记得学术了,可能会开出一扇小门,但随即会因另一个政治运动到来,立即将小门关上,并且对前一段的“开门”进行无休止的清算。还有所谓“趋时写作”、“遵命写作”,学人的自我、自尊荡然无存,弄得搞学术的人无所措手脚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了厄运。这便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命运。回想当年的境遇,我多么期盼能有一种真正自由、自主的学术,社会能对学术以应有的尊重,又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,学人能自由伸展自己的才能。作为一个“过来人”,我相信这样的期盼是多数学人的愿望。

二

我的真正学术生涯是从1979年重返大学教学岗位开始的。那时候正是郭沫若热情欢呼“科学的春天”来临之际,一切都在拨乱反正,在学人面前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,我的做学术的念头又一次被燃炽起来。但面对再一次不期而至的机遇,我忽然发现,在外面闯荡多年一事无成后,我与学术已相距甚远,而投入真正的学术,需要知识,需要积累,需要养成学术思维头脑,需要把握课题研究能力,这一切,我都十分欠缺。

说起来,我的求学生涯也算得是按部就班,十分正规:小学六年,中学六年,大学四年,从一个校门走到另一个校门,一年都没有脱节过,然后又是进大学教书,总之都是在知识和学术的环境中一步步走来。但就做学术而言,我总有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,原由就在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失。先天不足是指根底有限,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。且不说五、六十年代接受的教育,无论是学术观念还是知识结构,今天早已“过时”,与现行学术理念有很大的不适应性,要实现已有知识与现代观念的有效对接,需要花出加倍的努力;就以当时的教育背景而言,我没有读过一所像样的小

学,像样的中学,像样的大学(我这里指的是五、六十年代草创期的浙师院),更无名师指点,找不准学术的切入点,难以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,所以要走上学术门径是难乎其难。我曾揶揄,如果说我后来在学术上还算有所成就的话,那走的也是一条“自学成才”之路。后天不足,则是指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,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耽误了我们太多的时间,我年青时代的大好年华都是在浪掷生命中度过的,从做学术的角度说,我至少有15年是白活了,当我置身在安静的校园中开始我的学术思考时,我已到了不惑之年。这可能就是人生中的大不幸了。

自知不足,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动力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给予我的驱动力,是必须像夏先生所说那样应“笨从本”,一切从头做起,从根本做起。所幸经过文革的教训,我对政治已毫无兴趣,到这时才真正称得上是“埋头学术”了,因此也就有了克服愚笨的勇气和精力。我的兴趣和学术积累,主要在现代文学方面,这原本就无很深的功底,且所学大抵早已荒废,现在重新检起来的确要花费很大的功夫。在头三年里,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教学上,一边是读书,读大量的书。对于现代文学,我稍稍熟悉一点的,其实也就是鲁迅,其他作家及其作品,大多是一知半解,于是就读作家文集,包括各种类型的作家,如《沫若文集》、《茅盾文集》、《巴金文集》、《赵树理文集》等。这样的阅读,有利于对一个作家的整体把握,这对于我后来跳出单一作家研究,尽力拓展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是大有助益的。此外,是收集各种研究资料,包括熟悉当时的学术研究状况,使自己尽早进入研究状态。同时也萌生了“赶快做”的念头,一定要把已经耽误了的时间尽快夺回来。“赶快做”,是鲁迅先生在45岁以后“记得了自己的年龄”时说的话,由此使他在最后十年里的创作成果超过了前20年。我每读鲁迅时,这一点总是使我感触颇深,这无形中成了我做学术时的一种重要鞭策力量。80年代中期,我产生了写作《萧乾评传》的想法,有幸结识30年代的著名作家萧乾先生(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之交),那时他已75

岁,但依然笔耕不辍,每年至少写两本书。萧老说,他也是在抢“被耽误”了的时间,因其错划右派被剥夺写作权利近20年之久。我当时还是盛年,相形之下,我自然更应努力。夺回被耽误了的时间,那时许多做学术的人都是这样说的,这并非豪言壮语,毕竟人生有涯,实在是其势不得不然耳。

我的学术研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。其实80年代出道的现代文学研究者,几乎都搞过鲁迅研究,因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始祖,不熟悉鲁迅就无法把握一部现代文学史。而就我自己而言,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我对鲁迅的喜爱,另一方面也因我时我的研究视野还很狭窄,我能做做研究的,也只有鲁迅。还有一个原因,则是因为躬逢其盛:198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,这前后掀起了一个鲁迅研究的高潮,“鲁迅热”几乎主宰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。我是在把握了这个机遇后,有计划地读书、研究、写论文,算是正式卷入了学术。第一个研究目标,是鲁迅小说。我在读鲁迅小说时,经反复琢磨、比较,总觉得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两本小说集的艺术方法是不尽相同的,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精到,应有一个“鲁迅小说艺术发展”的题目可做。1980年暑期,我在教完一轮现代文学课程后,便开始了对这一论题的思考与研究,着重阅读与“小说艺术”有关的理论书籍,逐渐理清思路,经两个月努力,作成了论文。作此文时,我还收集到不少鲁迅论小说“讽刺艺术”的材料及在其创作中的表现,但这难以纳入本文,需另做一篇,这在下半年也完成了。料想不到的是,我的学术研究竟然开局良好,一炮打响。当时因名不见经传,这两篇文章发表当然都不会很顺利,文章寄出去后就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但最后的结果却出奇得好:一篇刊发在1981年第5期《齐鲁学刊》,并且做了该刊的头条;另一篇在几个刊物“旅行”两年后,竟在本学科最高级别的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1982年第3期发出了。这无异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,也增添了不少自信心,至少说明,尽管我的学术功底并不深厚,但只要努力,我还是能做做学术的。

被燃起的热情,终于再也难于遏制。从1982年开始,我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学术研究了。那时候我还在专科部教书,教学任务相对繁重,但科研渗透于教学,给予我的是更多的乐趣。我一直认为教学与科研犹如车之二轮、鸟之双翼,是互相促进、相辅相成的。教材内容经过自己的研究、咀嚼,讲授给学生,就有别一种效果,我从学生的接受中能体察得出来,这无疑对我的科研积极性有很大的促进。此时我也努力注意扩大研究范围,从鲁迅逐渐移到其他作家和文学史研究。我以为这是突破自己所必须的,如果研究只囿于一点,要取得很大长进是不可能的。这样做,成效就很显著。1983年一年,我就在国内各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篇,那是我早期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年。此后每年都有不小收获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助教,有这样的成果在校内就颇为轰动,校报还对我作了专访、报道。1986年,我从助教越级晋升为副教授,这是对我教学和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,这当然也成了又一种动力,由此使我的学术研究积极性被进一步激发起来了。

三

回望我走过的学术道路,80年代是起步阶段,其时的研究范围选定、理论思维模式的养成乃至研究方法的采用,对我整个学术架构的形成产生不小的作用。更重要的是,起步阶段的拼命精神对我日后做学术也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紧张、繁忙的学术生活中度过的。那时是40多岁,年岁大了些,但尚可称年富力强,“赶快做”催促我犹如百米冲刺般读书作文。回想那时精力多么充沛,至今都不敢相信。上副高后,我定下的下一个目标,是向教授冲刺,而且要尽可能缩短时间距离(这个目标后来花了三年半时间达到了)。实现目标的途径,是要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层次。80年代末,我的论文发表数量已达到近百篇,唯一不足的是缺少学术专著,因此还必须继